

共情·创新·融合

——新时代《论语》翻译策略及其传播路径研究

戴静

(济宁学院, 山东 济宁 273155)

【摘要】《论语》翻译不能单纯被定义为是译者、翻译过程和策略以及读者所形成的一个合作整体,更应理解为是在翻译传播的基础上与社会产生情感上的共鸣,建立某种联动关系,从而与文化、权力、意识形态以及社会现实有机融合在一起,创新新路径,以期为中国典籍翻译和文化传播提供新思路。本文从《论语》翻译历史进程的角度出发,分析和探究了新时代《论语》的翻译策略及其传播路径,进一步诠释了新时代儒家哲学思想,以供参考。

【关键词】《论语》; 翻译策略; 创新路径

一、前言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论语》英译本已达70多部,学界对这些译本开展了广泛研究。国内《论语》英译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主要聚焦文本的错译问题。2000年至2004年,《论语》英译研究每年发文量极少,研究大多聚焦在语言层面的对等研究。2005年开始,《论语》英译研究开始升温,研究集中在《论语》的译本(对比)研究、《论语》核心概念词的研究、单一译本鉴赏以及译本翻译技法分析。随着翻译研究出现文化转向,研究视角突破了语言层面,文本外的因素被纳入研究视野,一些研究者开始从外部因素来审视《论语》英译。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继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学界开始更多关注儒学文化传播功能与策略、译者身份与话语权、翻译规律与文化影响力、译文接受度情况等问题。

目前,《论语》英译研究涉及语言学、翻译学、哲学、历史学、传播学、国际关系学等多学科交叉研究。关于《论语》英译历史和传播研究,主要集中在语言层面、文化软实力、海外读者接受度等方面,对不同历史时期《论语》译本特征、传播效果,尤其是对当前时代《论语》翻译策略及其传播路径的研究还有待于丰富。

二、《论语》翻译历史进程

自1809年《论语》首次直译为英语至今,《论语》英译直译历史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8世纪末-19世纪40年代):儒学经典初译期。18世纪后半期,英国完成产业革命后急需汉语人才辅助打开中国市场。1809年,英国新教传教士马士曼翻

译了《论语》前十章。1822年,柯大卫将《四书》首次从汉语直译为英语,该译本得到了英语世界学者的重视,成为西方学术界研究中国儒学思想的重要文本。第二阶段(19世纪40年代-20世纪上半叶):以耶释儒、耶儒互参翻译期。该阶段采用以耶释儒、耶儒互参的翻译策略,译笔带有较为浓重的宗教色彩。第三阶段(20世纪上半叶-20世纪80年代):回归原典翻译期。这一阶段回归原著,译本较为理性、客观传达原文本内涵与思想。第四阶段(20世纪80年代-今):中西融合翻译期。该阶段译本数量显著增多,英译本进入一个中西融合、不断创新的新阶段。

三、新时代《论语》翻译策略及其传播路径研究

(一)《论语》英译本文本范式

以译文文本更接近原语还是目的语为评判标准,《论语》译本文本分为两大范式:“文本中心”范式和“文本相关”范式。“文本中心”范式是以忠实反映原文为首要任务。“文本相关”范式则是偏向目的语规范,以文本与当下社会的关联性为重心。这两种范式代表了一个翻译过程中的两个极端方向,实际的翻译总是游走于这两者之间。

“文本中心”范式下的译本,其重要功能在于传达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和原貌,帮助西方厘清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文本相关”范式在一定程度上对儒学典籍进行“改造”和“利用”,其作用在于扩展翻译研究的视角,适应不同时代、不同层次的读者需求。

(二)新时代《论语》翻译策略

新时代以1988年安乐哲与罗斯文的《论语》

合译本问世作为起始阶段，而我国新时代的文化建设使命和任务为：站在弘扬中国文化的立场，树立文化自信，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维持良好的语言体系，以提升国际话语权，体现中华民族独特的语言魅力。因此需要进一步优化我国文化传播方式，构建完整的现代化文化传播体系，提高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力，以确定中华文化国际地位。当前新时代背景下，《论语》英译本既应考虑到传达中国儒学典籍的特质和中国文化的特色和原貌，也要考虑到在一定程度上对儒学典籍进行“改造”和“利用”。

不同历史阶段，《论语》译本中所涉及的文化高频词都显示了不同的文化策略。安乐哲与罗斯文的译文与森舸澜的译文相比更加倾向于中国哲学术语的文化内涵传播。比如“天”在《论语》中出现了19次，各个译者的翻译不尽相同，根据“天”哲学概念，西方更加强调独立性，而中国的“天”与理性、伦理形成一个完整的价值信仰体系，强调以人为本的思想，是中华民族的灵魂与根基。基于此，安乐哲与罗斯文在诠释儒家哲学思想概念方面稍强一些，充分体现了文化本源性差异和文化特色，森舸澜主要在段落注释中体现儒家哲学思想概念。在“天道”的翻译过程中，理雅各、辜鸿铭、刘殿基、安乐哲、罗斯文以及森舸澜的翻译策略各有千秋，其中，理雅各、刘殿基的翻译以基督教的解读为主，强调儒家与基督教义是非常相似的，可以将“天”与基督教概念联系在一起。辜鸿铭则追求译文的通俗易懂，强烈主张儒教是中国的国教，与西方国家的教堂宗教是一样的。安乐哲与罗斯文是通过过程哲学思维来翻译和诠释儒家经典的，以弘扬中国文化语言特点，从文化传播的角度出发，安乐哲和罗斯文“意译+拼音+文字”的翻译传播策略可以有效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构建中外融通话语体系，有利于中华文化交流与传播，可以更好地维护我国的世界话语形象。所以，新时代《论语》英译，首先应构建共情·共鸣的文化翻译方式，探索文化认同，实现话语体系博弈共赢；其次应扩充创新性翻译策略，延展文化认同形成话语体系的涟漪；再次需探索融合性翻译方法，重构文化认同的创新话语体系的同频共振。在融合翻译策略选择时，可借鉴安乐哲与罗斯文的比较哲学方法、森舸澜的文化释义方法，采用意译+汉语拼音+汉字的创造性翻译策略与文化语境补偿策略，尽量再现原文语言文化特色，加强英语读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

（三）新时代《论语》英译传播路径

结合新时代我国文化建设的主要使命与任务，

《论语》翻译传播的创新路径应采取多路径、多模态、互动式的传播路径。应充分重视数字赋能在《论语》传播中的作用，充分发挥互联网等现代社会传媒、自媒体等的重要作用。重视《论语》文化产业输出，通过英语《论语》专题网站、《论语》图书漫画、可爱、可敬的孔子形象的双语建构等方式开展《论语》英译传播。

1. 明确中国文化的主体地位。要想增强我国的文化软实力，首先要明确我国的文化主体地位，有效诠释现代性儒家哲学思想。众所周知，一个国家文化价值观的形成和塑造在国家、社会发展以及国际交流的地位至关重要，充分体现了国家的号召力、认同力以及向心力。中国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决定着国人的价值取向，思想行为 and 世界观，也是国际社会了解中国文化的基础。所以，怎样充分利用《论语》的对外文化传播来弘扬我国的传统文化和儒家思想，与世界审美观相契合，是宣传中国传统文化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将传统文化与现实文化有效结合在一起，根据社会发展实践和时代发展要求进行正确取舍，遵循“古为今用、以古鉴今”的文化传播原则，从而赋予传统文化的创造性、创新性发展，充分体现传统文化的新时代发展内涵。基于此，对于《论语》的翻译传播途径，需要彻底摒弃传统的消极文化元素，积极发扬《论语》的优秀文化传统，赋予以人为本的时代精神，将中华文化内涵传递到国外。这就要求译者把握中华民族文化要领，立足于中华民族文化特色，以高度自觉的热情去翻译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跨越读者和时空的限制宣传《论语》儒家文化，确定世界文化话语权，以得到世界认知，建立完整的中国翻译话语体系。

2. 遵循翻译文化传播规律。要想重新诠释现代性儒家哲学思想，首先要充分了解《论语》翻译传播新路径，明白现阶段翻译传播体系的弊端和不足，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翻译传播规律是译者基于现状与趋势的发展新导向，结合翻译策略以及有效传播方式以满足读者需求的内在关联关系，受众于翻译过程，不受主体主观意识所牵制，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受文化传播全球性影响，作为译者要在不同文化形态中体现自己的个性，保持对其他文化形态的开放和认同态度，从而在不同文化形态的对话交流和认同中，重新构建人类文化的普适性价值观，充分体现人类本身的终极关怀、异质文化的个性化特点，实现普适性与相对辩证性的统一，创造富有生机和活力的“世界文化”。所以，所谓的世界文化既符合

相对性的普适文化，又充分体现了不同的文化形态，而且将人类广泛的、永恒的价值定义为理想的人类新文化。基于此，在国际社会强调融会贯通和对话交流的要求下，译者更加需要遵循《论语》的传播翻译规律，从宏观角度出发，深入研究中国历史文化语境、历史环境、翻译途径以及译者的翻译特点，以了解经典儒学“适应需求、融通发展”的历史发展进程。从中观的角度出发，译者需要研究和探讨英汉语言文化传播差异，以及译者主体的主观性影响。从微观角度出发，在《论语》大量陈述选哪个言说的背景下，省略了孔子说话的具体语境，因此需要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填补孔子言说的具体前后文语境和文化语境。

3. 满足新时代读者要求。重新诠释现代性儒家思想的另一个重要目的是满足新时代读者的实际需求，以判断中华民族文化是否得到有效突破为主要依据。在充分研究《论语》国际文化传播与信息反馈的基础上，重新诠释儒家哲学思想，可以有效提高《论语》在世界文化多元化语境背景下的异地地位，实现全球文化趋同化与传统文化的互动认同。

《中国话语海外认知度调查报告》结合调查地域，通过样本量等定型定量方法，总结相应的词汇特点：越来越多的中国传统文化词语通过汉语拼音的方式与英语话语体系有效融合在了一起，这充分表明随着祖国的日益壮大，国际社会对中国话语的认知度、理解度逐渐增强，逐渐提高了对中国的话语认知需求，中国民族文化的思考方式和话语特点也被世界所认知和接受。在《论语》的翻译实践中，中华民族儒家哲学概念的翻译和传播难点是文化空白和读者的文化差异。因此，要想使中国历史文化面向全世界，首先要构建中外融通的话语表达体系。例如：在《论语》“克己复礼”的翻译过程中，理雅各、辜鸿铭、刘殿爵、安乐哲与罗斯文、森舸瀾的译文不尽相同，汉语中的“礼”与英文翻译中的propriety/rites是不同的。周礼作为孔子时代传统文化，礼是外在因素，仁是内在因素，两者合二为一才能称为“复礼”，作为孔子思想的核心，贯穿于《论语》的始终。“克己复礼”宣扬的是一种传统文化精神，而不是作为礼的行为方式存在，礼和传统文化精神是永恒的价值代表，与礼的与时俱进方式是不同的，所以，“克己复礼”不能直接采用直译或者意译的翻译方式。

4. 加强翻译的媒介传播功能。加强翻译的媒介传播功能是重新诠释儒家哲学思想的有效工具。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加大《论语》的民族文化教育力度，加强《论语》作为对外传播体系

的话语权建设，实现主流价值与民族精神的有效统一，以满足其自身发展要求，从而增强人们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和民族凝聚力，聚集力量。（2）进一步诠释《论语》的翻译文化传播策略，以提升儒家文化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使儒家文化价值观得到世界的认可，建设文化意义强国。（3）充分发挥互联网等现代化媒介和政府赞助等作用，在此基础上提升《论语》的国际输出力。（4）要对《论语》的文化产业输出引起足够的重视，结合《论语》专题网站、《论语》论坛、《论语》的影视翻译等方式，创建《论语》经典文化品牌，拓宽市场新格局。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文化对外传播逐渐成为国家文化软实力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之一。所以，要充分重视《论语》的翻译文化传播能力，利用《论语》的文化影响力和号召力，发扬和壮大中华民族优良文化传统，使儒家哲学思想走向全世界。

四、结论

新时代《论语》英译，应构建共情·共鸣·融合的创新性翻译策略，重构文化认同的创新话语体系。新时代《论语》英译传播应采取多路径、多模态、互动式的传播路径，明确中国文化的主体地位，遵循翻译文化传播规律，以满足新时代的读者要求，充分重视数字赋能在《论语》传播中的作用，充分发挥互联网、自媒体等在《论语》英译传播中重要作用，有效扩大中国传统文化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使更多读者理解和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明确《论语》的翻译传播新导向，进一步创新《论语》传播新路径，积极传播和重新诠释优良儒家文化思想。

参考文献：

- [1] 杨艳, 肖辉. 视觉化审美趣味的过滤与《论语》翻译中的变异——以蔡志忠漫画《论语》英译本为例[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2022 (4): 112-113.
- [2] 杨艳. 《论语》翻译中变异现象的美学分析——以林语堂《论语》英译本为例[J]. 齐鲁师范学院学报, 2023 (1): 143-151.
- [3] 高忱忱, 潘洁. 生态翻译学视域下《论语》理雅各英译本探析[J]. 现代语文, 2022 (6): 6.
- [4] 史青玲, 辜鸿铭《论语》翻译的跨文化互释[J]. 德州学院学报, 2023 (5): 44-45.

该研究为山东艺术科学重点课题(L2023Z04190394), 2021年济宁学院大学英语重点课程建设项目阶段性成果。